

*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人写的历史 必须是 人的历史吗？

西方史学
二十论

王晴佳 著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 西方史学二十论

王晴佳 著

出品人: 姚映然

责任编辑: 周官雨希

营销编辑: 胡珍珍

封扉设计: 周安迪

出品: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3.5 字数: 283,000 插页: 2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9.00元

ISBN: 978-7-208-16176-4 / K · 29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 西方史学二十论/
王晴佳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光启文景丛书/陈恒主编)
ISBN 978-7-208-16176-4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史学史-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K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4358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

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

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谨以此书献给郭圣铭先生（1915—2006），
感谢他的引路和教诲！

文
景

Horizon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西方史学的传统与转型

- 01 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 ——四个方面的考察 17
- 02 论修昔底德对西方史学的贡献 56
- 03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 70
- 04 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形成和演变 87
- 05 简论兰克与兰克史学 101
- 06 近代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实践 118
- 07 历史的总体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迪 135

08 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149

09 试析现代西方史学中的相对主义倾向 162

10 卡尔·波普尔的批判历史哲学及其意义 181

第二部分 “二战”之后的思潮和趋向

11 现代德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以比勒菲尔德学派为例 197

12 米歇尔·福柯和现代史学思潮变化之渊源 209

13 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 232

14 西方当代史学与“后学”思潮——以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讨论 270

- 15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294
- 16 悖论的力量——后殖民主义对现代史学挑战的双重影响 329
- 17 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
——第 20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 352
- 18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史学观念的变化 383
- 19 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 389
- 20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402

序

我曾在微信上转发过一篇十分火热的文章，题为《怀念八十年代》。我不清楚其精确的阅读量，但估计一定不少，而作者在得到大量读者的反馈信息后，几天之内又发布了修订版。尽管有两个版本，但该文的开头不变：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百花争艳的年代。

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

八十年的激情、浪漫、理想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及普众心中的乌托邦。¹

稍微比较一下《怀念八十年代》的两个版本，读者会发现修订和增补主要在诗歌的部分——修订版比原版增添了更多那个年代让

1 http://m.sohu.com/a/291177474_556792。顺便提一下，山东大学的王学典教授出版有散文集，亦名《怀念八十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

人怀念的诗人、作家和歌手及他们的作品。具体而言，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等，作家有琼瑶、金庸、刘心武、张贤亮、张承志、陆文夫等，而歌手则包括了邓丽君、毛阿敏、韦唯、成方圆、蒋大为、那英、崔健和日本的山口百惠等许多位。毋庸置疑，上述这些人士及其作品在那时可谓家喻户晓。

但是，80年代还不能完全为上述这些人士所代表，因为那个年代并不仅仅生成了轻歌曼舞、辗转回肠的文化，尽管，这些柔和动人的歌声和朦胧美丽的诗篇，对于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中国人而言富有巨大的吸引力。换言之，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文化”的热度，从街头巷尾一直扩展到大学校园，后者在影响力的方面，同样十分深远，让人怀念。那一代的年轻人，既吟唱流行的歌曲，亦钻研深奥的理论。具体而言，校园和学界的“文化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热衷引进西方学术文化。自那时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前者的研究已有不少，风云一时的人物如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朱维铮、刘再复等，均是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相较而言，对后者的研究则相对少见。¹而依笔者管见，若以“热度”而论，80年代对西方学术、西方文化的热衷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相比，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工作的华裔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80年代“文化热”的研究，但大都侧重那时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如Jing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Xudong Zhang,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例外的是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该书描述了西方文学理论对那时中国文学界、戏剧界的影响。有关中国史学界吸收引进西方史学，参看笔者(Q. Edward Wang), "Encountering the World: China and Its Other(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1949-89,"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3 (Sept. 2003), pp.327-358。

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曾著有《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其中“新时期的译潮——1978年至1999年的上海翻译出版界”一章，用“译潮”来形容当时出版界、读书人对西方翻译小说和学术著作的空前热情。邹著引用了当时初出茅庐的作家陈丹燕的回忆，来描述那时读者对重印出版的世界名著译本的喜爱：“淮海路新华书店外面，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简陋的木头门里白炽灯放着淡灰色的光，灯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书，简朴而庄重，就像那时的人心。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邹教授写道：“这种万人空巷抢购世界文学名著的景观，至今回想仍然让人神往。”¹

对于西方文学的喜爱，显然只是冰山之一角。但窥一斑见全豹，足以让人看到80年代“文化热”的高度和广度。邹教授在该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描述和分析那时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当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类著作，动辄印上几万册，充分显示了当时读者的理论兴趣和素养。比如田汝康、金重远编译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和张文杰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笔者躬逢其盛，也亲身经历并参与了那时学界对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和推广。譬如自1986年开始，我与上海的几位年轻学者一起，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俗称“黄皮书”丛书）的编委，主要负责历史学方面的译介。南京大学杨豫老师翻译的、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便是该丛书收入的第一种历史学译

1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第350页。

著，出版之后影响甚大，拥有大量读者。¹

如果说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热”有“复兴中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引进西学”两个方面，那么史学界的情形则显得有点特殊。以个人的观感而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史学界痛定思痛，对中国历史和史学的传统均有颇为激烈的批评。比如那时讨论比较热烈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就是一例。而世界史的学者则研究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希望借此强调批判封建主义的重要性。² 这些讨论促使史学界的同仁认识到“史学危机”的存在，而有关“史学危机”的热烈讨论，则又有助于人们清楚地看到更新史学方法的必要性。总之，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比，80 年代的史学界对开放视野、引进西学抱有更大的兴趣。为了迎合这个需要，那时受过西方教育的、我的老师辈学者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王养冲，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开大学的杨生茂，东北师大的丁则民等先生，都应邀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撰文，介绍和评价西方近现代史学，为开展西方史学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以中国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的年代。1949 年之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重视

1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的编委会成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昕，复旦大学的王沪宁、张汝伦、汪耀进、武伟、杨鲁军，以及华东师大的陈琦伟和我。邹振环对那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有介绍，见其《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第 367—372、392—394 页。当事人陈昕对“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也有详细的回忆，见其《“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收入陈昕，《出版忆往》，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第 15—34 页。

2 吴于廑先生那时发表了《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 15、16 章》和《伏尔泰史学杂议两题》，收入《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 214—244 页。王养冲先生发表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载《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这些作品都代表了世界史家在 80 年代对批判封建主义所做的努力。

始于 50 年代向苏联学习时期。通过苏联史家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中国学者间接接触和了解了西方史学在现代的变迁。譬如苏联史学理论家康恩所著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便于 1961 年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也直接通过阅读西方史学的原著加以研究，并对其进行翻译。1961 年，教育部在上海召集部分留洋归来的学者举办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的会议，参会者有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林举岱等先生。1962 年北大的齐思和先生重译了美国史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的《新史学》（之前一版由民国时期的留美学者何炳松翻译），吴于廑先生等人则主持编译了西方史学名著的小丛书。那时中华书局有一杂志《历史译丛》，起初主要翻译苏联学者的论文，但在 60 年代也翻译了西方学者的著作。举例而言，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先生 1962 年在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刊发了《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何兆武先生立即将之译成了中文，次年刊载于《历史译丛》。

1966 年“文革”的爆发，使得这一刚刚起步的教学和研究被迫中断。但上述学者并没有停止他们的研究。1975 年去世的耿淡如先生翻译了西方史学史的名著，英国史家 G. P. 古奇 1913 年所著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该译本于 1998 年出版）。而郭圣铭先生则努力从事西方史学史大学教材的写作。1983 年，郭先生所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篇幅不大，但言简意赅，概括了西方史学从古代到 20 世纪初年的演化历程，为中国学者写作的第一部西方史学史教科书。翌年湖南师大留美归来的孙秉莹先生出版了《欧洲近代史学史》，此书主要根据美国学者 J. W.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编著而成。之后孙先生又与谢德风合译了汤普森的原作，与耿淡如所译的《十九世纪的历

史学和历史学家》一同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上述这些著作的出版，与这些学者在当时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一道，足以证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在80年代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笔者有幸赶在80年代初进入这一领域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代人在不同程度上经历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热潮。1982年毕业的时候，我决定报考研究生。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即将出版，他也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记得有次在华东师大图书馆的西书阅览室巧遇郭先生，那时他还不认识我，我上前与他打招呼，表示了我的想法。他表示欢迎并问我：“请问您尊姓大名？”他对一个年轻学生的这种“敬语式”问话，让我略吃一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与郭先生熟识之后，便觉得此举毫不奇怪，而是他谦逊为人的一个写照。

在跟随郭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不但系统地阅读西方史学的名著，同时也练习写作和发表习作。本书收入的一些论文，有的正是在那个年代写作和发表的。郭先生对我向外投稿、发表的做法，并不积极支持，反而告诫我需要谨慎。他曾数次对我说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教导我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落笔分量轻重之重要。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常常向我们讲述他翻译、写作时如何反复斟酌词句，有时为了是否加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的”字而考虑再三。我在以前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写过，郭先生的译作，读来顺畅自如，让读者毫无“洋化”之感，充分显示他精通中英两种文字，至今让人深为叹服。¹记得与郭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也曾

1 王晴佳，《怀念郭圣铭先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第363—368页。